

# 古人的择友观

□ 石志刚

古代官员仕宦生活是紧张有序、丰富多彩的。《毛诗序》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择友是参与仕宦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很多名臣和思想家在论述如何择友方面，有着精深的见解和独特的分析。

## 砥砺学问

钱穆在《中国五伦中之朋友一伦》中说：“朋友一伦亦与人之为学最相关。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明代的曹端在永乐年间出任霍州学正，教学有方，“诸生服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当时，有一个叫李德的人也在霍州讲学，见到曹端后，非常佩服他，嘱咐自己的学生要好好学习曹端请教学问：“至其知古今，达事变，未学鲜或及之。古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诸生得人师矣。’说完，李德离开了讲学的教室。曹端亦为李德的品行和学问所感佩，“命诸生延致之，讲明正学”。曹端与李德互相学习、礼敬，谦虚成为二人处理友谊关系的润滑剂，不仅促进了学问增长，而且还加深了友谊的厚度。

宋代两大文化巨子苏轼与黄庭坚，二人交游“最密”。“风节行谊，铄美一时，炳耀千古”，互相了解对方，“苏公真知鲁直者”，黄庭坚“亦心契东坡”。二人初交，始于诗文品评。当苏轼看到黄庭坚的诗文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进而产生想见黄庭坚的想法；“观其文以求其为人。”黄庭坚知道后，“传音相闻，阁下又不以未尝及门过誉斗筲，使有黄钟大吕之重”，以此表达对苏轼知遇之情的感恩。二人随后诗文往来，友情进一步升华。等到时机成熟，二人见面，切磋诗艺，感悟人生，虽各有所悲，然托扶帮助，寄寓深情，见出友谊真谛。

## 事业相助

在择友的时候，如果能在内心强化道德感，在道德感的指引下去做正确的公平的事情，定会为这份友谊以及事业添上一笔浓墨重彩。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名臣徐阶非常欣赏张居正的才华，张居正亦敬重徐阶的为人。当时，权奸严嵩为首辅，操持权柄、排斥异己、为害一时。严嵩“忌阶”，这时，“善阶者皆避匿”。然而，张居正不惧严嵩权势，仍旧保持与徐阶的密切关系。等到徐阶取代严嵩成为首辅之后，对张居正进行事业上的提携，“倾心委居正”。张居正与徐阶既是朋友又是同僚，在友谊交往与处理政务中，关系得到检验，事业亦得到相助。

古代社会，官员身居要职，其身份和职位显要，身边聚集许多人容易做到，等到卸官离任，其身份和职位不再显要，身边之人散去，这就形成了对友谊的考验。

古人说：“交友之道难矣。”汉代有个叫翟公的官员，当他是太尉的时候，门庭若市、宾客塞门。等他罢官后，门可罗雀、宾客稀少；等他复为廷尉时，之前的宾客又想登门。他在门口写下一段文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段话验证了友谊的真伪。所以，明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发出感慨：“人当意气相得时，以身相许，若无难事；至事变势穷，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这就印证了张居正在同僚落魄不得势之时仍然能够与其交往的可贵，翟公在罢官后其宾客离散不能与其共担风险的悲叹。

## 精神鼓励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君子所望于人者，以礼相奖、以情相好已耳。”朋友之间，由于才华吸引，走到一起，就要用“礼”“情”维系好所形成的友谊。这里的“礼”是指尊重，“情”是指友谊。尊重和友情不因富贵与贫穷、职高与职低而有所不同、有所改变、有所差异，这也许是择友的时候，互相之间进行精神鼓励所值得提倡的地方。

况钟在永乐四年在靖安县当了九年小吏。当时，在吏部担任司务的平思忠同况钟有来往，并且有恩于况钟。后来，当况钟被提拔为苏州知府后，一直不忘平思忠的恩情，还经常拜访平思忠，态度非常谦逊，“数延见，执礼甚恭”，还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去服侍平思忠。而平思忠家境贫寒、廉正厚道，“未尝缘政道有所干”，没有因为过去于况钟有恩，就请求况钟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平思忠当年没有因为况钟职位低下而瞧不起他；况钟没有因为自己职位升迁而对平思忠改变态度；况钟没有因为自己职位低下而产生自卑心理拒绝与平思忠交友；平思忠没有因为自己家境贫寒而产生去求已经拥有大权的况钟办私事。二人对友情的理解超越世俗，成为世人传颂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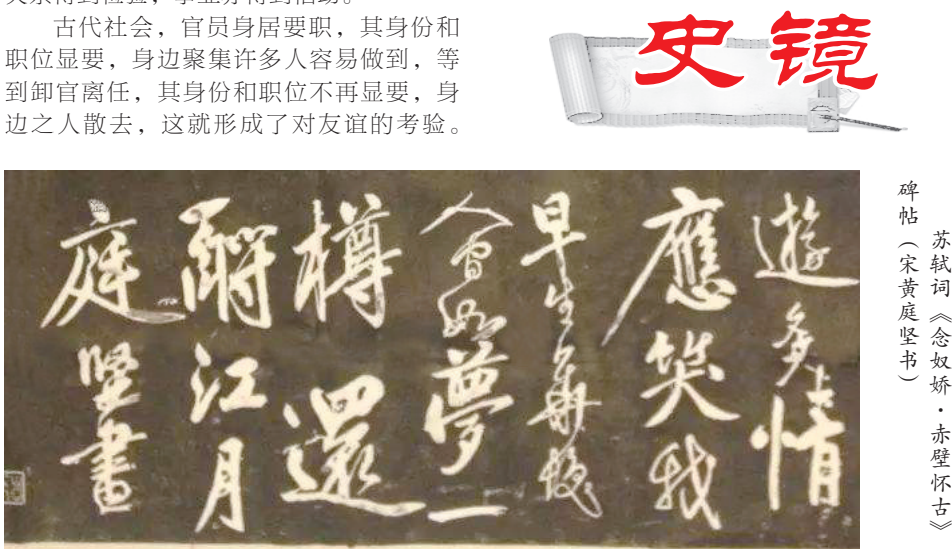
## 及时规谏

王阳明说：“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功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化，驰然日就于颓靡者。”从国事来看，为国家荐才，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利益关系的更高层次的友情。这份友情可能会遭到误解，但是如若真是真友，会直言相对，收获更多。

《围炉夜话》中强调“直话”是交友之真谛：“同人聚处，须多说切直话，方见古风。”晋武帝时名臣郗诜因富有才华、做事公正被吏部尚书崔洪推荐而任官。当时，郗诜担任总领纲纪的左丞，因事弹劾崔洪，遭到崔洪的讥讽：“我推荐了郗诜，而他回头来弹劾我，这真是自己挽弓射自己啊。”郗诜听到这句话后，举实来澄清误会：春秋时期晋国的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但韩厥按军法处死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却向大家说，你们可以恭贺我了，是我推荐了韩厥，他做了司马且能胜任其职事。紧接着，郗诜说，您为国家举荐我，是因为我刚直不阿，我以自己的才能被举荐，就要发挥刚直不阿的作用，都是为了国家公事，为何您说这样的话呢？崔洪听了之后非常惭愧和敬服。从郗诜的阐释中，既能看到对吏部尚书崔洪识人之明的肯定，又能看到对崔洪因个人荣辱而产生误会进行的中肯回应，把真正的友情构架在为国做事这一点上，可算是真朋友的诤言。二人的友情在郗诜的“答”与崔洪的“服”上达成共识并进而升华。

“良友时时警发砥砺”成为正确择友的初衷和目标。三国东吴有两个名臣，一个叫吕岱，一个叫徐原，两人经过交流，发现有许多共同话题，而且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吕岱发现徐原“慷慨有才志”，推荐他担任侍御史。“原（徐原）性忠壮，好直言，岱（吕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又公论之”。吕岱知道后，更加尊重徐原，而且还以之为益友。等到徐原去世后，吕岱非常悲伤，感慨地说：“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

可见，在仕宦生活中，如果能遇到良友，那是何等的幸事。



## 为人苦奋 为官廉洁

范仲淹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其母只好改嫁朱氏。幼年的范仲淹就备尝人生的艰辛，但因此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他穷则愈奋，发奋苦读，终于叩开科考之门，后又去应天书院苦读4年，每日三餐以凝粥为食，但学问却勇猛精进，为日后成为千古名臣砥励了品格，打下了学识根基。

如果说范仲淹童年、少年备尝艰辛实属人生无奈，但他登第出仕后仍过着清苦的生活，则是儒家士人修身的自觉。纵观范仲淹从政生涯，其廉洁崇高、敢于担当，可谓行为世范、高山仰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科举登第后步入仕途。最初在安徽的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即相当于现今的县法院审判员。他为人耿介，常抱着案卷与郡守进行辩论，且将争论的内容记录在板壁上，以至他离任时，板壁已再写不下字了。司理参军之职只是最底层的公务员，薪酬微薄，其时范仲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匹马，因囊中羞涩，以至他回家接母奉养不得不卖掉此马以换取盘缠，而徒步回到故里。

范仲淹以廉俭治家甚严，要求子孙秉持简约家风，其“子孙皆守其家法”。史载，范仲淹母亲在世时家里还很贫穷，其后虽然出仕发达了，但他廉俭之风不变，若家里没来客人，餐桌上很少见肉，妻子儿女的日常用度仅能维持即可。俗话说，家严出孝子。范仲淹严谨的家风涵养了范家子孙的节操，范家后人亦多以忠孝处世。

范仲淹曾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表露心迹：本人虽然官小禄微，但一年的俸禄也有三十万钱，百姓耕田一亩方收获一斛，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按此推算，则农民耕田千亩才有三十万的收入。如果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那么本人的俸禄用度相当于百姓耕种二千亩的收成。耕种二千亩田地，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凝结了农民多少血汗。若本人还不为国为民尽心尽力，饱食终日，那就成了“天之蠹”“民之膻”了。范仲淹对天地及黎民常怀敬畏之心，知廉知耻之心可昭日月，殊为难得。

范仲淹晚年任杭州知州，其时许多朝中退休官员以及文人高士在西京洛阳筑宅安家，颐养天年。他在杭州的弟子们亦劝其到洛阳建宅

（上接1版）为了支援罢工工人，陈云不仅把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工资捐了出来，还组织一些青年工人上街动员和宣传募捐。以后，就被推举为印刷所的罢工委员长，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斗争。

在这段时间，陈云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商务印书馆进步同事的引导下，陈云来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外围组织——上海通讯图书馆。他开始如饥似渴地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书籍。他反复读，反复琢磨，并结合自己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经历，以及到城市后看到、听到和读到的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深入思考，不断追求真理，最后确定信仰。正像他后来所说：“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陈云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革命意志和出色组织能力，引起商务印书馆组织的高度重视。罢工胜利后，1925年八九月间，20岁的陈云，经商务印书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董亦湘和发行所第一位党员恽雨棠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云说“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

# 敢于担当范仲淹

□ 王家宏

安家，以娱天年，但他皆一一谢绝。据《言行录》载，范仲淹入仕凡38年，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一直保持廉俭之风，未增加一名仆役。

## 先忧后乐 敢于担当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了范仲淹为官从政的强烈担当意识。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于泰州西任溪盐官，此地濒临大海，常有海潮淹没田地之灾。范仲淹致信知州张伦，建议修筑堤堰以防海潮，张伦阅信欣慰——不想部属中有如此关心地方建设的人才，欣然采纳范仲淹之议，并调任他任知县，负责筑坝修堰事宜。范仲淹受命不敢懈怠，迅速组织民力物力筑修捍海堰，结果消除了海潮之患，使大量土地成为肥田沃土，受益百姓甚众。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由睦州调任苏州，他新任职时，适逢洪水泛滥，庄稼颗粒无收。范仲淹一边开仓赈灾，救济难民，一边迅速组织人力疏通河道，兴修水利，以彻底根除水患。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苏州遂成鱼米之乡、人寿年丰之地。无论范仲淹到什么地方任职，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培养人才。关注民生疾苦、为民办实事，成为他从政生涯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政绩，那是并不难的事，在官场上最难的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犯有严重不正之风而去犯颜直谏。因为前者不仅没有政治风险而且还会得好的名声，后者则有直接的风险后果。但范仲淹不顾官场险恶，曾三次犯颜直谏，因而三次遭受贬滴。

天圣七年（1029年），皇帝欲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面对如此有违国体的行为，不少大臣私下颇有微词，但没人能站出来劝谏。秉性正直的范仲淹挺身而出，他直接上疏到刘太后那里，并指出皇帝“有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一套，而要专干革命”，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 共产党人终其一生，都要为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情况多么复杂，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

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时期，陈云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组织赋予的使命。1935年6月，陈云根据中央决定，悄悄离开长征队伍，机智化解重重险情，只身穿越千里白区，到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但此时上海的地下组织已经遭到极大破坏，大批负责干部被捕。陈云后来回忆说：当时收集了报纸公告，清醒地数了一下，认识了党的叛徒有72个，到外滩去随时会碰到叛徒。有一次，在桥头，果然遇到叛徒，而且已经被认出来。陈云临危不乱，捏准叛徒怕死的心里，双目怒视，压低声音对他说，如果你指认我，

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意谓皇帝孝敬太后可以在内宫率宗族行孝亲之礼，但若率百官在朝堂之上行礼，则有损国体皇威。范仲淹还在上疏中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范仲淹此举，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结果，刘太后盛怒之下，将范仲淹逐出京师，发配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范仲淹此举，就连举荐他在京任职的晏殊也不理解，责之有沽名钓誉之嫌，行为有失轻率。范仲淹不便顶撞恩师，回了一封言辞委婉的信诉说理由：如果身为命官眼见朝廷犯错都不敢劝谏，就对不起那份俸禄，也对不起江山社稷；如果大家都放任不正之风，则国何以为堪？表明自己不愿做明哲保身的太平官。即使范仲淹被外放边远江湖，他仍然时不时上疏朝廷提出自己的一些利国利民的意见，由此可见其拳拳的报国之心。

不久，刘太后去世，范仲淹以其正直的名声获得朝野尊重，很快被皇上召回任专门规谏朝政的右司谏。其时宫中发生了因后妃争宠而导致郭后误伤帝额事件，仁宗恼怒，加之权相吕夷简进谗，便决定废后。范仲淹认为，郭后并无过错，皇上宠爱的妃子人品还不如郭后，废后不仅有违朝廷先例，更担心由此引起朝纲混乱，于是范仲淹上疏阻止仁宗废后。其结果是触怒龙颜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浙江桐庐）任知州。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再次回调京师，任礼部员外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对朝廷选人用人相当关注，当时权相吕夷简用人严重失当，吕怕生性耿直的范仲淹弹劾自己，便设计将其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以繁重的公务转移其视线。而范仲淹不但将开封府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且抽空将吕夷简用人不当以百官图的形式供皇帝预览。恼羞成怒的吕夷简则先下手为强，告范仲淹越职议事、挑拨帝相关系，并结朋党。这时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起来声援范仲淹，却正好中了吕夷简污其

“结党”的圈套。皇帝有失贤明，而吕夷简生性奸滑，这样，范仲淹被第三次外调京师，去饶州任知州（今江西波阳），一年后又调润州任知州（今江苏镇江），后又去越州（今浙江绍兴）赴任。但范仲淹每到一地，不是兴农桑，便是修水利，或办学校树人才，丝毫不见其处江湖之远的抱怨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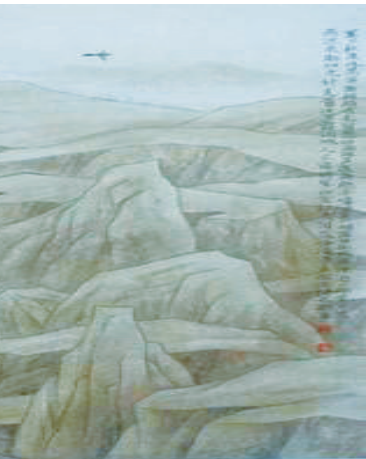
## 救国危难 治军有方

范仲淹敢于担当的精神不特表现在每到一地为官做出斐然政绩，面对不正之风哪怕是当朝太后、皇上、宰相之不正敢于斗争。更殊为难得的是，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存亡之秋，他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北宋真宗时期，盘踞在甘肃、宁夏一带的西夏国常威胁北宋边庭，当时西北边境吃紧，陕西安抚使韩琦向朝廷请求调范仲淹协助防敌，范仲淹遂由越州调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范仲淹来到陕西，经实地探索，认为西夏乃游牧民族为主，强于行动之迅捷，而我方的御敌之策应采取以静制动的方略。但韩琦不以为然，决意以五路进讨，结果损兵折将，也由此证明范仲淹军事韬略的高明。

这时朝廷恢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官阶，范仲淹同时担任永兴军兼延州（今延安）知州。范仲淹整军经武，裁汰老弱，起用能者，甚至大胆起用曾犯过错误但有能力的人。他认为现在边庭局势紧张，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过”而弃之不用，则“有过”之人便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正所谓“兽穷则变，人穷则诈”。陕西在范仲淹、韩琦的苦心经营下，尚武之风兴起，武备充分，西夏统治者慑于范仲淹威名，数年不敢轻举妄动。

往事已千年，但范仲淹一身正气、清正廉明及敢于担当的儒家知识分子风范，对我们今天的从政者如何做一个公道正派的好干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击，被剥夺了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陈云说：“我还是共产党员，还可以看些书，研究一些问题。”他自己出钱，让秘书订阅《人民日报》《参考消息》。1969年10月，陈云被下放江西南昌蹲点调查。他带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等三大箱书学习，思考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对我国经济建设影响的问题。1972年4月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抓外贸，陈云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研究期货，突破了“左”的思想束缚。

陈云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1995年4月10日下午14:04分，陈云在北京医院去世。当天上午，在生命弥留之际，还吩咐身边工作人员要缴纳党费。去世后，根据他的遗言，把大脑和器官捐献给医学解剖。陈云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要“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奋斗到底”时说，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就是奋斗到“翘辫子”。

（作者系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馆员）